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为了证明自己的法力是如此的强大，天气巫师让人带来一个罐子，一边念咒语，一边往罐子里倒水，没有一滴水从罐子中间漏下来，只有在咒语停止念诵之后，水才一下子从罐中漏出。居住在乡村的天气巫师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农田免受雹灾，在农忙时带来雨水，作为报酬工作的报酬。他们全神贯注，一部分虔诚，但是，假如尽管他们作了努力，庄稼还是死于雹灾的话，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甚至要全力赔偿损失。人们也经常要求他们让老天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不要下雨，以便人们在好天气的时候重新或者举行宗教舞蹈仪式。西藏的天气巫师使用最重要的法器是玛石（玛石），这种法器，人们会发出的一种号（据说这种法号的发声可以吓退所有试图阻挡降雨的妖魔），或。玛石的帮助，有经验的天气巫师可以判定天气变化，如果玛石低沉或“不祥”，那么坏天气即将出现，如果玛石高昂而欢快，那么就预示着不会有雹灾的威胁。要判定一块田是否会带来冰雹，巫师要把水装进一个通常用五种贵金属铸成的平底容器，然后观察盘中反射的天空云彩。根据一些特定的迹象——这些迹象是巫师得出的个人秘密——来判断云是否会带来冰雹，假如云有冰雹的迹象，巫师要立即开始进行相应的祈祷形式。此外，还有其它很多显示给有经验天气巫师的有关天气变化的征兆。不吉利的征兆指示：例如，云彩从北方飘向南方，或者从西方飘向东方；大地云彩逐渐降成小块；或者如果清晨时薄雾或霞光呈灰色或红色等，都是不可预测的即将降雨的征兆。从云彩的开头形状颜色及其移动的方向，天气巫师可以推判出要请求下雨，应该去祈祷哪一种神祇。例如，如果从东方飘来一块块棉花状的云彩，那么就必须崇拜王藏魔，如果是从南方飘来像珊瑚或张开的头发一样的云状云，那么就是魔女玛姆玛玛了降雨云，因而要进行尊奉女魔的仪式；一块由西而来的云彩呈孤雨色花中云状，可以看作是魔魔玛玛玛的降雨。此

新平解

PDG

13A08 117

98
K297.5
8
2:13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三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C 592322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编委会成员

陈庆英 耿昇 向红笏 褚俊杰 冯良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三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125 字数:283,500

1997年4月第一版 1997年4月西藏第一次印刷

印数:01—2,500册

ISBN7-223-00968-3

Z·58 定价:14.50元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 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之二:1251至1254年事件的某些解说…… [匈]史尔弼 著 王启龙 邓小咏 译(1)
- 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之三:供施关系
…… [匈]史尔弼 著 王启龙 才旺拉姆 译(28)
- 迄今无解而归于八思巴名下的元代文献集
…… [美]白桂滋 著 邓小咏 译(38)
- 再论“河西九曲”之地
…… [日]佐藤长 著 张铁纲 译(47)
- 北宋时期河西的藏族部落与佛教
…… [日]岩崎力 著 李德龙 译(61)
- 评《拉堆绛(家族)世系》
…… [美]艾略特·史伯岭 著 陈庆英 译(82)
- 康区林仓土司历史试探
…… 达西次仁 撰文 陈庆英 译(93)
- 敦煌藏文早期写本传统
…… [前苏联]勒·斯·萨维茨基 著 张云 译(120)
-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几个社会术语考释
…… [匈]罗纳·塔斯 著 葛小冲 译(134)

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

- [日]木村隆德 著 向红笳 译(166)
- 关于饮酒有害的藏蒙劝世文书
- [前苏联]德·庸东 阿·盖·萨兹全 著 张云 译(229)
- 藏族一妻多夫制中父子间亲属关系的价值及其确认
- [美]南希·列维妮 著 玉珠措姆 译(248)
- 在尼泊尔宁巴社会中,藏族妇女在法律、工作和经济
- 上没有保障的状况
- [美]南希·列维妮 著 玉珠措姆 译(285)
- 哲蚌寺的组织结构和法事活动
- [德]格西·格德罗珠 著 嘎·达哇才仁 译(308)
- 僧兵研究..... 梅·高尔斯坦 撰文 黄维忠 译(321)
- 普巴——西藏的橛形法器
- 约翰·C·杭廷顿 著 罗文华 译(340)
- 曼陀罗(坛城)的结构和功能
- [日]立川武藏 著 熊文彬 译(359)

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之二：1251 至 1254 年事件的某些解说

[匈]史尔弼 著 王启龙 邓小咏 译

1251—1254 年间蒙古对西藏施行的政策制度方面极有价值的资料可在不同语言(主要是藏文、汉文⁽¹⁾和波斯文⁽²⁾)的史料中找到。其中有些早已为人所知,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里提到的其它史料却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³⁾。还有一些史料至今没有学者问津。

我的目的在于揭示建立蒙古统治西藏的政权之动力源泉。西藏施政上的配合及其与蒙古帝国内部的真正联盟当然是在 1268—70 年最终完成的。⁽⁴⁾可是,在此之前有一段长期的准备过程,此过程的最初步骤至今未予全面研究。在这方面,不同史料所指内容在有些地方互相矛盾。比如,汉文史籍提到过这些年里对西藏的几次进攻,而藏文史籍或许也说是军事行动,而不同之处在军队指挥官们的头衔或有关军事活动的年代。本文的基本目的将是一一列举和讨论这些事件——虽然有些情况下不能达到目的,但还是想看看在哪儿能

解决史料中的分歧和矛盾。文字上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模糊不清,蒙古人对西藏人新的态度在我们的史料里对所有事件都有很好的记载。

萨迦班智达在 1251⁽⁵⁾ 年逝世前,一直主要致力于避免一场蒙古入侵西藏的威胁和赢得蒙古人给予苯教派的种种特权。⁽⁶⁾ 就在那年,蒙哥当选继大汗位,这在蒙古帝国⁽⁷⁾ 史和西藏史上都有巨大影响。蒙哥在 1251 至 1252 年间⁽⁸⁾ 的诏令表明了对萨迦派最高权力的承认;⁽⁹⁾ 免除寺院的各种赋税意味着,这笔税贡将由社会上的其他阶层⁽¹⁰⁾ 来支付;谈到括户⁽¹¹⁾ 则可解释为西藏施政联合的初步措施⁽¹²⁾。

根据某些史料的隐秘记载,阔端曾于 1251 年被蒙哥任命为西藏的首领(?)⁽¹³⁾。《元史》的记载却有不同,说蒙哥信任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 Qoridai(忽哥赤,汉语里为和里得 Ho—li—tan 或 Ho—êrh—t'ai)⁽¹⁴⁾,此人 1251 年曾指挥过蒙古军队和中国军队进攻过吐蕃。《元史》也记载了由于此次军事行动成功他曾受到的奖赏⁽¹⁵⁾。

谈到吐蕃,我们应该注意到“吐蕃”和“西番”这两个术语在最初的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晚期的文献中“西番”一般指整个西藏,在元朝时期指的是整个(吐蕃)国家的东部边区⁽¹⁶⁾;而“吐蕃”包括整个藏区(从西部藏区到东部康区,见下文)。谈到上文所述的军事行动时,魏里认为“汉文史料中所述属于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当时蒙古人并未侵入中部西藏地区⁽¹⁷⁾”。虽然魏里没有指出吐蕃和西番的不同,但是如果汉文史籍的“吐蕃”这里包括东部康区,那么“西番”相对而言就是“边境地区”,魏里的推测就可以保留。

对蒙古早期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和施政措施方面最重要的

资料,我们或许应归功于达斯的研究⁽¹⁸⁾。在他的文章里,我们会发现如下内容(p. 96 及其后):

“贡噶坚赞[ཀུན་དགའ་བླ་མ་མཆན། 即萨迦班智达][从蒙古⁽¹⁹⁾]回到西藏后,就任命释迦桑波[ཤཱ་བཟང་པོ།]为全西藏⁽²⁰⁾的本钦(总管)……对其总管印象如此之深……故而他下令,除伍由巴(འུ་ཡུག་པ་)和夏尔巴意希迥[ཤར་པ་ཡེ་ཤེས་བྱང་།]外,所有僧侣都得向他致敬⁽²¹⁾。

死神⁽²²⁾带走 E—chan⁽²³⁾ 阔端汗⁽²⁴⁾ 后,忽必烈汗……当了中国的皇帝⁽²⁵⁾。他把宫邸迁到……汗八里(Khanbali-k,即北京)……⁽²⁶⁾简言之,此后⁽²⁷⁾,他命令手下一员将军塔门(Tāmen)⁽²⁸⁾接管西藏以便更好地统治。塔门来向他辞行时,他面谕:‘藏人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古代,那个国家曾建立过君主政权,藏人军队曾数次入侵(p. 97)中原……⁽²⁹⁾萨迦派大师是由我们任命的。他们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因此,马上去萨迦,设法运用你的外交手段使西藏完全处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对此……塔门……回答说,‘……叫西番⁽³⁰⁾那个国家的人民……勇猛而强悍,既不遵从本国法律,也不听从中原法令。我们的戍边将士就未能使他们改变抢劫的习惯。陛下的仆人接管西藏如何能降服他们,此行花费方面又有何安排呢?皇帝命令他应前去完成任务,从皇宫宝库中带上必要钱物作为礼品。到了萨迦后,他应把这个国家分成大小不等的甲姆⁽³¹⁾(地区)。以便于行政管理。根据它们的范围和性质,即根据人口的疏密配给各个甲姆适当的土地。

从皇帝那里得到证明身份的诏令文件,再为僧俗(首领)带上恰当的礼物之后,塔门带上大批武装卫队和大量

的勘察官员去接管西藏了。到萨迦后，他当着专程聚在萨迦的人们宣读了诏令⁽³²⁾。他派勘察官们到各地勘察地形，又根据他们的勘察报告将萨迦到汉地边境之间的地域划分为27个片区或“甲姆”⁽³³⁾……

他把这些甲姆分配给当时业已划分好的14万户[ཁོ་རྒྱལ་]，并任命一位万户长[ཁོ་རྒྱལ་པོ་]或地方长官统治他们。他宣布了大汗对全藏的宗主权……塔门回到中国……皇帝任命他(p. 98)主持“宣政院”[?]大衙门[?]。为了监督那个已划为27个甲姆地区的施政……皇帝任命他手下名叫 Ijilig⁽³⁴⁾的鞑靼贵族为西藏的驻扎官，授予他 Thon—ji(?)⁽³⁵⁾这种鞑靼爵位。他是由中国皇帝派到西藏监督萨迦派治下的西藏政治事务的首位大臣……

Thon—ji Ijilig 派往西藏后，皇帝亲自率领一支大军到南诏⁽³⁶⁾。那里的人们根本不能对他的胜利之师进行反抗。他⁽³⁷⁾将安多地方的两个省划归中国，把上朵地区[朵甘思](现代康区)划归西藏。⁽³⁸⁾

在忽必烈皇帝统治的第10个年头⁽³⁹⁾，萨迦派法主八思巴喇嘛被封为皇帝一家的精神导师……”

根据这一叙述匆忙下结论会过于轻率。我们并不掌握达斯所用的史料，也不能对他译文的准确度作出判断。在有些地方，甚至不能区分哪些是达斯原始材料自己加上去的字句。史料上所载最重要事件的年代问题——塔门的出使和 Ijilig 的执政等——均远未弄清。据我所知，有关阔端之死和忽必烈之即位，达斯的描述里是同一个时期。但是，尽管蒙哥当选大汗不久，忽必烈就成为“北方地区”(紧接着还有西藏)的统治者，藏文史料里通常是这样记述：他是在1260年才当皇帝并迁都

汗八里(即北京)的。

然而,不管达斯的陈述里有什么样的混淆不清,文献表明在进攻南诏之前或其间,西藏施政方面的确已有某些变化,并发生过军事行动。⁽⁴⁰⁾可惜,有关这段时期蒙古官方施政手段的具体情况,我们目前尚无任何更加详细的文献(除了本开头提到的那份诏令外)。但是,在有关早期军事行动的汉、藏文史料中,我们也能发现某些可资参考的东西——如果我们同时掌握了忽必烈和八思巴关系的某些材料的话,因为它关系到政权已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而产生的西藏统治权的变化情况。

先看汉文史料,我们了解到,1254年“忽必烈征服南诏后进入吐蕃,这里的统治者 So—ho—ro[?]⁽⁴¹⁾归降了。”⁽⁴²⁾依奥卡塔之见,忽必烈1254年是从云南穿过康区返回的,但是,无论是奥卡塔(okata)⁽⁴³⁾还是科迪尔(见注(42))均未提及这位不明不白的藏王。

沙畹⁽⁴⁴⁾也研究过这次军事行动,称忽必烈是在1252(1253)⁽⁴⁵⁾年9月发兵进攻云南的,同年10月过了黄河。1253(=1254)年5月到达六盘山(见注(49))。他还说,同年8月,“他(忽必烈)从 miu—tshou 穿过藏区,到达了四川北面明水上游的 Son—p'an⁽⁴⁶⁾。”⁽⁴⁷⁾本文不在于补订沙畹所述忽必烈在此战役中的行军路线——弗兰克在别的文章里已经做过了。⁽⁴⁸⁾这里只要注意到一点就足够了;他所描述的实际上指的是忽必烈回甘肃的路线(参阅注(42)和(43))。(在伯希和的文章里,忽必烈访六盘山是在1254年5月。⁽⁴⁹⁾)1254年,忽必烈征服南诏首府大理⁽⁵⁰⁾以后,据说他已放心地将其政府委托给了兀良合台⁽⁵¹⁾,此人1254年曾侵扰过西藏、云南和四川边境地

区⁽⁵²⁾。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藏文史料，我先引用八思巴1252年写于凉州王宫之佛殿(འིང་ཁུ་ཕྱིར་ཁབ་ཀྱི་གཙུག་ལག་ཁང་།)⁽⁵³⁾的一封信，题为《法主⁽⁵⁴⁾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⁵⁵⁾。其中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有用的段落有如(函，叶321b)：

“即使大自在者[即萨迦班智达]圆寂之后，因法主本身慈悲之法力，吾等众人在此俱得享安乐。王子蒙哥都 mong—go—ta (m . nggedü)⁽⁵⁶⁾ 亦抵[凉州?]⁽⁵⁷⁾ [对吾等]甚为关怀。蒙哥 mong—go (m . ngke)⁽⁵⁸⁾ 汗已经即位，⁽⁵⁹⁾ 他的亲笔诏书⁽⁶⁰⁾ 已向帝国各方宣布。”⁽⁶¹⁾ (译注：此据英文原文所译故与藏文时有出入之处。以下同。)

提到王子蒙哥都就很有意思，因为他在某些史料里与忽必烈和八思巴的首次会见有关，见 dpa'—bo (pp. 795—796)：

“[阔端]后悔他先前没有请法主(即萨班——译注)讲法，(后来)他请求八思巴仁波且讲法⁽⁶²⁾。在1253(水牛)年八思巴喇嘛19岁时⁽⁶³⁾ 与 mu—gu—du—la⁽⁶⁴⁾—阔端(k . d . a . n)⁽⁶⁵⁾ 的长子一起见到了王子忽必烈薛禅(Qubilai Se . en)⁽⁶⁶⁾。看到八思巴仁波且身、语、意具祥时薛禅大悦，说：‘萨迦巴！到我们这儿来吧！’⁽⁶⁷⁾ 于是就请求他留在身边；此后[八思巴]作为薛禅的供应喇嘛39年！”

《红史》(RA, 叶22a)里也有类似的描述⁽⁶⁸⁾：

“……众生怙主(原文如此)八罗巴罗追坚赞……生于阴木羊年(1235)，9岁时⁽⁶⁹⁾ 作为伯父(萨迦班智达)的随从到了北方。后来忽必烈皇帝在六盘山⁽⁷⁰⁾ 时，北方的

王子蒙哥[或蒙哥都⁽⁷¹⁾——史尔弼]与八思巴上师一起前去会见,[忽必烈]十分欣悦,送蒙古马军一百骑给北方王子⁽⁷²⁾地方[宫殿?],去迎请萨迦巴(八思巴);[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因此,这些史料表明,萨迦上师转向忽必烈,象征着对西藏的统治权的转移,这是受蒙哥都(见注(64))的影响——他的名字我们已经见过,也在八思巴著作的其中一篇——1253年写于六盘山的文章里出现过。⁽⁷³⁾(汉文史料也讲到忽必烈访问过此山,但要晚一年。)不管怎么说,八思巴著作与此说法不符:1252年他尚未搬到“大皇帝(即忽必烈)的居处”开平府⁽⁷⁴⁾,1253年冬到玛尔康(མར་ཁ་མོ་ལོ་པོ་) ⁽⁷⁵⁾,1254年以前他在朵甘思⁽⁷⁶⁾(ཏོག་མོ་ལོ་པོ་)。(也许1255年春他尚在西藏。)他没有提到六盘山。忽必烈的名字在八思巴作品里首次出现于1254年(□函,叶109b),但在1252年有关开平府的文献里(见上文)提到了他。为忽必烈⁽⁷⁷⁾而作的首部作品署于1253年。

好了,我们看看有关1251—1254年间诸事件的一些藏文史料。松巴堪布的年表⁽⁷⁸⁾(p. 26)上说:

“1251:……萨班于幻化寺(ལྷ་ཁྱེ་) ⁽⁷⁹⁾(圆寂),阔端王[亦卒]。⁽⁸⁰⁾

1252:生于1207(火兔)年⁽⁸¹⁾的蒙古人蒙哥即大汗位。蒙古军队⁽⁸²⁾夺取了西藏蒙地(མོང་པོ་)的城堡(མཐོང་པོ་) ⁽⁸³⁾袞波东(མཁོན་པོ་གཏོང་)。

1253:……萨迦人八思巴和王子忽必烈两人结成‘施主和福田’⁽⁸⁴⁾的关系。萨迦人统领西藏十三万户。⁽⁸⁵⁾

1254:蒙古皇帝(即忽必烈)率兵征哈喇嘛章国(ཁ་ལ་མ་ཇ་) ⁽⁸⁶⁾即今大理)⁽⁸⁶⁾,翌年凯旋。”⁽⁸⁷⁾

有关1252年攻克城堡和蒙古人的另一次进攻,松巴堪布⁽⁸⁸⁾有更详细的记载:

“萨班到达藏古,在他1251(铁猪)年死后的第二年,蒙古皇帝⁽⁸⁹⁾阔端⁽⁹⁰⁾派遣蒙古军队到了西藏,攻占了蒙地(མིན)的衮波东(མགོན་པོ་མཁོ་རྩེ)城堡,并杀死了许多人;后来⁽⁹¹⁾甲却杰巴(ཁྱལ་ཆེན་འབྲས་པོ་ལྔ་པ་)⁽⁹²⁾被处死。”

巴卧祖拉陈瓦的史书也谈到了这些事件:

“萨班1251(铁猪)年去世。阔端命令རྩེ་བེའི་(T. 30 betei)⁽⁹⁴⁾的蒙古军队[攻打西藏],翌年,མིན་གྱི་མགོན་པོ་མཁོ་རྩེ་ལྔ་པ་城堡及其它地方被攻克。”

“……八思巴上师……于1253(水牛)年……见到忽必烈薛禅。……在此前一年的铁鼠年⁽⁹⁵⁾蒙哥⁽⁹⁷⁾即大汗位并命令རྩེ་བེའི་(T. 30 betei)率领蒙古军队从‘北方地区’⁽⁹⁸⁾攻打西藏,མིན་གྱི་མགོན་པོ་མཁོ་རྩེ་ལྔ་པ་城堡的无数众生被杀;翌年,ཁྱལ་ཆེན་འབྲས་པོ་ལྔ་པ་⁽⁹⁹⁾及其他一些人被ཧུར་ཀློང་率领的蒙古军队处死。”⁽¹⁰⁰⁾

概而言之,有关蒙古人1251—1254年间施政和军事活动方面的材料如下:

I

1. 1251/52和1254年⁽¹⁰¹⁾发布的诏令;
2. “甲姆”制度的建立和13万户的划分(见注(33));
3. 忽必烈的领土构成。

II

1. 塔门到西藏表明对“西番”的征服(见注(30));
2. 忽必烈在康区的活动;⁽¹⁰²⁾

3. 1254年兀良合台在边境地区的远征；

4. Qoridai, Do-be-ta'i 和 Hur-ta'i (=Qoridai?) 对西藏的进攻。

就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来说,上师对皇帝的影响不可能始于1258/59年前,他的地位似乎在1260年左右才得以确立。⁽¹⁰³⁾正如我们所知,虽然1252/53年间八思巴与忽必烈一起在开平府,但1253—1258年他主要住在西藏和五台山⁽¹⁰⁴⁾,他这些年的作品里只有两次提到这个首府。⁽¹⁰⁵⁾从1258年起,他频繁地提到这个首府,而且为忽必烈而作的文章绝大多数始于这段时期。⁽¹⁰⁶⁾另外,汉文文献⁽¹⁰⁷⁾里所载,八思巴的影响增大的时间亦在1258——1259年间,这与其他文献⁽¹⁰⁸⁾里的史证完全吻合。

注 释

(1) 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是 O·Franke 的《中华帝国史》IV—V, 1948—1952柏林版(以下简称 Franke IV 或 V)。其它的论著在下列各注中提及。对元朝关于西藏的汉文史料全面研究的论著尚待撰写。

(2) 我一般是依据 J·A·Boyle 的《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们》,1971,纽约/伦敦版。对许多名字的不同拼写法等,有时也参考 Ju. P·Verchovskij & B·I·Pankratov 的 Rašid-ad-din, Sbornik letopisej I, 1960年 moskva 版。

(3) 然而,尽管1888—1910年伦敦版 E·Bretschneider 的《以东亚史料为据的中世纪研究》I—II 经常被引用,1920年伦敦版 H·Cordier 的“Ser Marco Polo (Nores and Addenda)”几乎全被忘记;最近的作品里 Howorth 这个名字常被提及,但 mailla 和 D'Ohsson 的著作却很少有人问津,对 Bičurin 同样如此,他的名字实际上今天无人知晓。

(4) 一般认为,西藏全面括户的时间是1268年,见 L·Petech 的《蒙

古在西藏的括户》，将发表于《纪念休斯·艾德华·里查逊藏学研究文集》，1979的牛津版。亦见 T, V, Wylie 的《蒙古首次征服西藏再释》载 A-IAS 37(1977), pp. 125—126; GTucci 的《印度与西藏》IV/1, 1941年罗马版, pp. 84—90; TPS, p. 257注(40), pp. 680—682注(52)。亦见本文注(11), (33)。

(5)参阅 D·Schuh 的《《如何理解邀请第五代噶玛巴入中国皇宫是蒙古法王西藏政策的延续?》》，载 Altaica Collecta, Hrsg, von W·Heissig 编, 1976年威斯巴登版, p. 234注(22)。

(6)他那封著名书信(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译注)的译文见 TPS pp. 10—12, 亦见 Wylie, p. 115。此信中的“census officials”(括户官员)所指不明(p. 11), 未说清楚。有关萨迦班智达在蒙古的活动, 可见括文(里面有些错误, 本文在别的地方已予注明);《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之一: 关于萨迦班智达的活动》，发表于《纪念休斯·艾德华·里查逊藏学研究文集》，1977年牛津版(此文以下简称 Szerb—译注)。

(7)蒙哥当选大汗后, 当然对他的敌手, 主要是窝阔台系的王子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些骚乱和暴动一直延续到忽必烈统治时期; 这里只要提一下阿里不哥和拔都的名字就足够了。藏文史籍似乎也谈到, 阿里不哥(或许是拔都)在西藏也有自己的某些联盟, 参阅 dPa'—bo p. 449; wylie pp. 108. 124—125以及本文注解⑨。值得注意的是, 阔端(窝阔台之子, 也许曾是贵由的法定继承者)及其后代们都反过来支持蒙哥和忽必烈。见 apa'—bo (p. 449): 1260年(铁猴年), [蒙哥]大汗卒于 མཁའ་མོ་ལོ་མོ་ 地区, 他的儿子和大臣们拥立成吉思汗七子阿里不哥即大汗位。驻在西夏故地的阔端王子等人拥立成吉思汗四子忽必烈薛禅宣布他为第二国王。事实上, 蒙哥卒年不是1260, 而是1259。这一时期, མཁའ་མོ་ལོ་མོ་ 表 man—tzü, 指南宋。关于蒙哥之死。见 Boyle, pp. 224注(95), 224—229等。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是拖雷的儿子, 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关于阿里不哥, 见 Boyle, pp. 248—252, 261—265; yuan che I—II (文中各处); P·pelliott 的“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沃尔部落史注记》),

1949年巴黎版, pp. 55—57等。提到1260年的阔端(阔端1251年已卒——译注)是颇为奇怪的。我想这里可能省略了 ལྷ་ (或者 ལྷ་ 等别的类似说法)。参阅 Wylie, 117注(50)及本文注(22)。这种推测得到了其他论著的进一步证实: 见 Boyle, 252。里面提到只必帖木儿的名字时与忽必烈当选大汗有联系。有关阔端及其后代对拖雷系的皇帝们的忠诚, 见 Boyle, pp. 21, 250, 262—264。(有关只必帖木儿, 见 Szerb 文中各处。)

(8) 八思巴的著作可见于德格版《萨迦五祖全集》, 请参阅索南嘉措 (བསྟན་འཕེལ་བླ་མ་ཆེན་པོ་) 编《西藏佛教萨迦派大师著作全集》VI—VII, 1968年东京版。参考八思巴著作, 我一般依据其中的草书数字, 这些数字与卷 VI—VII 目录中所说八思巴著作的目次数码一一对应。敕令文献尚存于八思巴著作里有两种版本(参阅306和316)。两著在 Szerb 文中各处均有讨论。第3种版本见于 D·Schuh 的《蒙古汗王向西藏宗教界发出的免除僧人课税的公开信》, 1977年圣奥古斯汀版, p. 111; 也请参阅 Szerb 注(57)和本文注(21), (59)。

(9) 西藏当然是在驻唐古特(Tangut, 西夏)——甘肃地区蒙古王子们的统治(无论“统治”的确切含义如何, 这里只是沿用陈说)之下。萨迦派的特权, 确切地说是由于它与阔端, 尔后又与忽必烈的联合而获得的; 在这一时期, 萨迦派的竞争对手们也在竞相寻求其他蒙古王子的庇护。毫无疑问, 止贡派和帕木竹巴派与旭烈儿伊尔汗(Hülegü)有受施关系,(参阅 Wylie, pp. 124—125); 此外, 据我们所知, 达陇派阿里不哥(参阅本文注⑦)之间, 蔡巴派与忽必烈之间, 噶玛派与蒙哥之间都有这种关系。有关噶玛拔希的生平, 几乎任何一种藏文史料都有或详或略的描述, 关于噶玛巴活动最详尽的描述见于 dpa'—bo——可是, 由于作者系属此派, 他极力夸大噶玛拔希的重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见 dpa'—bo, pp. 446—461, 792—797, 797—798。所有的史料里都一致认为, 他是在1255年与忽必烈相见的。有些文献还讲述了在忽必烈宫廷里噶玛拔希和八思巴之间发生的一场魔幻般的比赛(见 G, pp. 98a—b; H, pp. 94—95; D, pp. 95—96; Schuh, pp. 96—97), 但有许多文献却省去了这个故

事(比如 S;RBA;dpa'-bo 等)。估计这场“魔幻般的比赛”使游牧民族的统治者神往不已,而1255年(或1258?见注⑨)这个时间刚好与上下文相符。有关各种不同的宗教争端,参看 Ed·Chavannes 的《蒙古统治时期的碑铭和法旨》I—II,载 TPSérie I, vol. V—VI (1904—1905),文中各处;H·Herbst 的《1253—1255年 F. 威廉·冯·鲁布里克亚洲腹地旅行记》1925年莱比锡版;P·Pelliot 的《蒙古人与罗马教廷》,1922—1923 巴黎版;P·A·Vanden_wyngaet 的“Sinica Franciscana”I, 1929年 Quaracchi 版等。与众所周知的事实难以相符的是,有些史书说噶玛巴是早在1253年已先(于八思巴)传过教。这个故事的基调是说,忽必烈的妻子,据藏文史料载,她是八思巴的坚决支持者,竭力说服忽必烈给予他高于先来访问忽必烈宫廷的噶玛巴和蔡巴喇嘛的特权。见 G, p. 976:dpag-bsam, p. 169;亦见 Schuh, p. 89和 D, p. 94(两著都只提及蔡巴和“其他人”)。至于说噶玛巴这次传教的记载是一个年代错误呢还是他们有某种历史基础呢,待考。正如我们所知,某些史料也把蔡巴派与忽必烈联系在了一起,见 dpa'-bo, p. 394, p. 794;pag-sam, p. 159;TPS, pp. 629—631, p. 651;R·A·Stein 的《西藏的文明》,1962年巴黎版, p. 54;D·Snellgrove&H·Richardson 的《西藏文化史》,1968年纽约版, pp. 149—152;I·J·Schmidt 的《东部蒙古及其王室史》,1829年圣彼得堡/莱比锡版, p. 393;Wylie, p. 108;Schah, 特别是 pp, XX I—XX II。也许蔡巴派的基本目标是在本派的辖区内建立牢固的统治。在我们所据的史料中,从未提到他们像萨迦派的人那样去努力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与噶玛巴、蔡巴和其他教派相关的,有趣而又重要的段落可见于上述提及的著述中;此外,可参阅 H·E·Richardson 的《噶玛巴教派:历史注记之 I》,载 JRAS, 1958年版;T·V·Wylie 的《活佛转世制度:西藏佛教的政治革新》,载 L·Ligeti 编《纪念杜参玛学术会议论文集》,1978年布达佩斯版;P·Tsering 的《元代皇室的宁玛派喇嘛》刊处同上;L·Hambis 的《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史与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载《拉露纪念文集》,1971年巴黎版;P·Demiéville 的《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概况》,